

中 / 国 / 传 / 统 / 文 / 化 / 知 / 识 / 小 / 丛 / 书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ISHIXIAO
CONGSHU

20

方志、野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6122

0-20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方 志
野 史

陈虹媿
编著

薛柏成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胡维革	
副 主 编	陈立忠	胡晓岩 郝国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晶娜	田毅鹏
	厉永平	李书源
	陈立忠	陈虹妮
	周玉和	郝国昆
	胡晓岩	胡维革
	赵永春	程舒伟
	雷 庆	颜震华
	魏克威	
责任编辑	刘慧杰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今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今天，如何使这一东方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使其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大业服务，是当代国人学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如何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接受中华民族优秀统文化的熏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以肩负起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更是时代赋予的宏伟重托。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这套丛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文化事象立题，共选择100种文化事象，每两种文化事象为一本，共50本。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力求内容科学准确，文字潇洒飘逸，风格新颖别致；既注重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又着眼于现实借鉴和运用；既写清每一种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目前状况、文化蕴含，又将与此事有关的传说、故事、诗文、人物等囊括其中；夹叙夹议，文史交融，妙趣横生。总之，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起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宣传典雅、崇高、真善美的作用，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

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远谈不上包罗净尽、解说确当，更不待说尽其精要、毕发奥旨了。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期日后有以改正提高。

编 者

1998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方志	(1)
一 方志的界定	(2)
二 方志的起源	(4)
三 方志的发展	(5)
四 方志的理论	(13)
五 方志的体例	(24)
六 方志的作用	(34)
野史	(42)
一 “野性”的写照	(42)
二 洪荒远古的传播载体	(55)
三 忠臣烈士的简短青史	(58)
四 豪杰义士的代言人	(61)
五 昏聩皇帝的腐朽侧面	(65)
六 奸佞之臣的耻辱册簿	(68)
七 文人墨客的野性白描	(72)
八 世风民俗的一面镜子	(78)
九 益智诙谐的小品段子	(80)
十 茫茫学海中的一只贝壳	(83)

方 志

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每当我们打开绚丽多彩的历史长卷，展现在眼前的不仅是堪以自豪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发明创造和文物古迹，而且还有大量记载着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历史资料及文化典籍。这些史籍历经沧桑，代代相传，至今已成为我们祖先创造人类文明的文字佐证和瑰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国古代“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规定，纵有二十五史等相沿不衰，横有通志、方志等递续纂修，这些浩繁的史籍纵横交织，构成一幅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以其体例严谨、记史翔实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纵观典籍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记载历史的书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天子或皇帝任命的史官或大臣编写的记述国家历史的史籍，这种记载历史的书被称为官修正史（如二十五史）；一种是郡、县、府、州派专人或由民间士人编写的记载某一郡、府，某一地方历史的史籍，即方志。所载内容是“以地域为记载中心”，专记一方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城邑变迁、物产资源、事件异闻等佚事的史籍。方志由地方撰修，有官修，也

有民修。它是我国独有的一种书籍，是正史典籍十分有益的补充。

在我国，方志编修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有关资料统计，至今全国已收藏的各种方志有 8 300 多种。我国现存的方志十分广泛，不仅有郡志、县志、府志、州志，而且还有镇志、村志、山志、江志等。志书内容具体细微，有的志书时间连贯，接续千年；有的志书则断限几十年内的时间，记写的人物事件，翔实完备到一事一案。我国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有自己的方志，这众多而卷帙浩瀚的地方志，在客观上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史籍群体，把全国各地的自然、社会、人文一一罗列记述，堪称为我国一部无所不包的大百科全书。

随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一些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经济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方志的出版将越发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资料发掘，不仅有益于地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也为子孙后代进行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最为形象直接的教材，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方志的界定

方志，即地方志书的简称。作为一种史籍，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所独有。方志编修，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代代相因，经久不衰。

从方志的字面解释，方，就是地方、区域。志，就是记录、记载、记事的文章或书籍。方志也就是记载一方之书的名称。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这一名称起源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周朝，他说：“取周官外史掌志之义，名曰方志。”一些史学家对章学诚引经据典和溯古之举持有异议，认为章学诚取《周礼》中外史的职责，并把它作为方志名称的来源出处，是为了强调“志乃史体”的观点。不管史学家们如何争论，章氏之说毕竟是关于方志一词来源出处的一种说法。

除此以外，方志一词在我国古代学者的著作中也多有出现。如晋代文学家左思在他的《三都赋序》中说的“验之方志”、北魏科学家酈道元在其所著的《水经注》中说的“方志所叙”、南朝宋代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说的“二汉方志”等等，都说明方志在当时是存在的，而且都是指地方文献而言，应当看作是最早的方志类的著述。据此可知，我国的方志作为书的名称，确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汉时代。

那么方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方志是以一定的行政区域作为其记述范围的。建国前的志书，大则有一省的通志，其次是为府、州、县志，小至一镇一村也有修志书的。我国包括边疆省或自治区，如黑龙江、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贵州、西藏等，莫不有志。绝大部分县都有县志。

方志是以一定行政区域的现实状况，作为其记述的主要内容。一般情况下，一个行政区域，在间隔几十年间就应该续修一次。因此，所记为一方之内、地近、时近，所见、所闻，是较为翔实可信的地方史事的记载资料。

方志是一定行政区域的综合性记述。所记述这一区域的疆域、沿革、山川地貌、地质、土壤、气候、建置、城镇、乡里、

物产、资源、财赋、户口、兵事、风俗、民情、社会、人物、组织、古迹、名胜、艺文、异闻、琐事等，莫不备详。这种记述是以人、社会为中心的。

总之，方志即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为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 方志的起源

关于方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起源于先秦史官的记录；一是认为萌始于古代地理的著述。

主张起源于先秦史官记录的说法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宋代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说道：“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他的意思是说，后世编修方志，是西周史官的“遗法”。清代的章学诚也认为：“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所说之遗法，非“职方”、“土训”、“诵训”，而是“外史掌……四方之志”。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甚至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在梁启超看来，方志不仅是古史之作，而且是古代史书的起源了。当代的方志学家朱士嘉也认为先秦诸侯国书是方志的雏型。

从方志的目的和作用看，方志同《周礼》中记载的外史、诵训的职掌是相近似的。外史记录四方，由诵训“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乐观博古所识”。四方久远之事，自然是重大事件

使王知道这些大事，博古以有裨益于政教。方志作为政书，其目的和作用与《周礼》中的记载是相似的。宋代《广陵志·序》中则说的更加明确，“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其重典也”。其后，明清民国以及建国以来的方志，都具有“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但是，先秦史官的记录，已无古籍文献可证。

主张方志萌始于古代地理著述的说法，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著录魏以来的方志书籍，都把方志看作是《山海经》的继续。明代有《禹贡》，“志由所昉”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古之方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见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可见，方志源于《禹贡》和《山海经》之说有一定的道理。

总而言之，宋代以前，尚未形成一种定型的文体，各种述地、记人的著作，互相影响、渗透、丰富、融汇，至宋时，才逐渐形成方志这一独特体例的撰著。

三 方志的发展

方志的发展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展，在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演变，逐渐形成为今天的方志体例。

那么方志是怎样逐渐演变而定型的呢？

从现有的文献看，方志的含义是在两汉时期明确起来的。从现今有辑本传世的《辛氏三秦记》和《三辅黄图》中可见一斑。

《辛氏三秦记》书中“所记山川、都邑、宫室皆秦汉时地理故事”。《三辅黄图》为东汉时期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所记皆为宫观、城貌、陵庙、明堂、辟雍、郊畴等内容。还有东汉的《巴郡图经》记载了汉代巴郡的境界、属县、盐铁官、户口。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志书多是记载民生、物产、山川、道路、都邑、宫室、陵庙、户口等内容。

这种记载地方地理的书籍被称为地记，是最早的方志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述地的地记极为兴盛，以长江流域及其南方各州郡为多。至今可知以地记为名的有交广两地的《交广二州记》、《广州记》、《交州记》，吴越地区的《娄地记》、《三吴郡国志》、《三吴土地记》、《吴郡记》、《临安记》、《会稽记》，皖赣地区的《淮南记》、《寿阳记》、《豫章记》，荆湘地区有《荆州记》、《湘州记》，巴蜀的《三巴记》、《蜀志》，其他的还有《徐州记》、《齐地记》、《洛阳记》、《邳中记》、《冀州记》、《中州记》、《秦记》、《关中记》，长江以北的齐冀鲁豫陕秦等地都有许多地记之作，甚至连边陲之地大西北也有《沙州记》，云南有《南中记》，可见当时地记是十分普遍的。此外，这种地记，在当时还有专述某一方面而单自成书的。如专门记述山川、风土、都邑、异物的专志，开创了地方志内容的一个新领域，成为方志中的一个门类。

我国汉代兴起的地记之作，中经魏晋，到南北朝时空前兴盛发达，这是因为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府对地方州郡的情况，需要了解和掌握，尤其是土地、人口、物产等情况直接关系到赋役的征集，道路、交通、民生是统治阶级治理各地根本依据。特别是魏晋以后，地方的封建势力割据政权和门阀士族力量增强，地区经济的发展，自然要带动记载一方的地

记之作兴盛发达起来。至于山川、寺观的志书兴盛，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崇尚庄子思想、政治仕途失意有很大关系。

与地记兴盛的同时，记述一方人物的著作也得以出现和发展。

记述一方人物的志书，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初年。《隋书·经籍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光武帝诏南阳作风俗传，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作《南阳风俗传》，表彰帝乡人物。自此，专记一方人物之作，成为郡国志书的一个支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益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陈留耆旧传》、《陈留风俗传》、《雍州文学官志》、《汉中耆旧传》、《袁州山阳先贤传》等人物志书相继问世。

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兼具述地和记人的著作，如《越绝书》和《华阳国志》。

《越绝书》据说是东汉袁康、吴平所编撰的地方史书。该书记载上起吴太伯，下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60多年间的史事，不仅记载了山川、城郭、冢墓，而且对夫差、勾践、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计倪等人事迹均有叙述，是一部地区性综合著作，它反映了现在江苏、浙江一部分地区的沿革、地理、城郭建设、生产、风土和历史事实。

《华阳国志》由东晋常璩编撰。所记上起远古，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该书不仅有述地的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还有记人的公孙（述）刘（焉）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以及大同志（记晋统一）、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后贤志、序志等，是一部包括地理、历史、风

俗、人物、少数民族的综合著作。

从两汉至隋唐，述地和记人两大体例一直沿袭不断，形成了我国方志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各类地志之书，大都内容单一，文字简略，体例也因人而异，还没有具备后世方志的规模。但它对后来方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一种新的述地之作——图经兴盛起来。图经是由地图发展起来的，远在先秦，便有了“土地之图”。“图”是地图，“经”是图上附属的文字说明。“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图经是以地图为主，载有少量文字说明。可是发展到后来，文字说明越来越多，经的地位和作用超过了图，成为以经为主，以图为辅了。

隋朝结束了300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局面。统治者为加强专制集权和统一，要各郡县上报图经，以便中央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绘制编修全国的图经。隋大业年间，皇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中央政府根据各郡的图经，绘制《诸州图经集》撰修《区宇图志》。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编修图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修一次（后改为五年），上报尚书省兵部，这是编修地方志制度化的开端。唐代地方政府绘纂的地方图经，现已发现的有《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这两部图经原藏于敦煌石窟，都已残缺，20世纪初被法国人伯希和掠去。《沙州图经》编于唐开元年间，是现存最早的图经。这两部图经残卷的内容有：行政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歌谣、古迹、异怪等门类，有图有经，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体例。

从五代到北宋，图经继续发展。宋代承袭唐代定期绘撰图

经的制度，每逢闰年编绘一次。绘撰图经，到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和郡国志书，虽然沿袭至隋唐，但到宋代已逐渐衰微。观今传世的图经采用进述、记人两相汇合的体例，以朱长文撰写的《元丰吴郡图经续记》为最早。在图经鼎盛的宋代，在名称上已经出现和方志并用的情况，而且以志命名的越来越多。《严州图经》的刻本便改为《新安志》了。宋代各州县普遍修志，“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据统计，宋代方志总数有近600种，流传至今的方志有30余种。著名的有绍兴《吴郡志》，仅南宋时就有乾道《临安志》、乾道《回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嘉定《镇江志》、宝庆《会稽续志》、宝庆《四明志》、淳祐《临安志》、淳祐《玉峰志》、景定《建康志》、咸淳《毗陵志》、咸淳《玉峰续志》等方志，这些方志编撰体例日益完备并标准化，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等全都汇集于一志，方志在内容上已经大大突破了宋以前仅限地理的范畴，扩大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占有显著地位。在体例的编写方面也开始有所突破，出现编年体入志的体例。如：高似孙在嘉宝七年（1214年）所作的《剡录》中设有“县纪年”一篇。自此，方志有纪（编年）、志、传等体裁，开始向正史体例方向演变。

从地记和郡国志书过渡到图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内容和体例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经经过一定的发展演变，由图为主渐变为经为主体，经成为正文，图反降为经的附录，再名之为图经，已经名不符实了。因此，开始用方志这一名称代替图经。这一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

元朝统治时期，地方志编修因为当时学术和文化不发达，远

不及宋代。据统计，元方志仅存 11 种，而且体例多沿袭宋代。至顺年间（1330—1332 年）《镇江志》中将户口分土著、侨寓、单贫、僧道；将学校分蒙古学、儒学、阴阳学和医学，反映了蒙古统治的色彩。元代学者熊自得纂的《析津志》是记述北京最早的方志书。

明王朝建立后，于永乐十六年（1418 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还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借以统一各地志书的体例和内容。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封建王朝制定的修志凡例，说明明代修志已经相当普遍。正如明代学者张邦政所言：“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除个别地方外，各省都修有志书，且南方多于北方。据统计明代方志现有 860 多种。明代对边疆志书的修定十分注意，主要是出于对北方瓦剌等少数民族军事防御之需要。明代的边疆志书《九边图说》、《九边图志》、《辽东志》、《筹海图编》、《四镇三关志》等，记述了边关的形势、军旅、粮饷、骑乘、兵器、职官等内容，仅《山海关志》就先后编修五次。

明代方志的类目设置大多分为两级，有层次，类门之下再分细目，比较严谨。在内容上有繁体 and 简体之分，在纪事年代上有通纪体和断代体。繁体有的细目达 124 目之多，如《句容县志》。简体有的只有几千字，如韩邦靖的《朝邑志》，不足 7000 字。

方志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编修方志的规模、成书量、修志理论研究、辑录旧志等，都有较大发展。

顺治年间，河南巡抚贾汉复修《河南通志》，督令所属府、州、县修志，河南“八郡十二州九十五县之志，渐次报竣”。康熙十一年（1672 年），诏令各省总督、巡抚依照《河南通志》和

《陕西通志》的格式，纂辑志书，总集翰林院，以便汇为《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再诏令天下各地修府州县志。由于康熙年间清政府一直督促修志，于是形成了一个修志高潮，在现存清志中，惟康熙年间志书最多。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了每隔60年修志一次的诏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等16种，都是此间修成的。

其后，嘉庆年间再修《大清一统志》，又督催各地编修方志。光绪十五年（1889年）编修《大清会典》，也谕令各地修志。光绪末年，学部下令修方土志，一批县乡土志相继问世，光绪年间编修《会典》和责成各地修乡土志，形成了清代又一次修志高潮。据统计，清代现存志书有7413种，为我国现存方志最多的朝代。

清代有许多著名学者把修志当作一种学术活动，并编纂出一批水平较高的志书。近代大思想家、学者梁启超曾说：“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如章学诚的《湖北通志》、《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戴震的《汾州府志》，阮元总纂的《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谢启昆的《广西通志》，洪亮吉的《泾县志》、《淳化县志》等，在当时颇有盛名。这些学者由于有了修志的实践，在探索修志理论方面形成了一门新学问——方志编纂学。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一批辑录古方志的学者，他们从唐宋类书以及其他史书中辑录了汉魏以来久已佚亡的古方志。如王谟纂的《汉唐地理书钞》，辑录了汉唐地记50种；陈运溶的《麓山精余丛书》，辑录了宋代以前的方志70余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也收录了古志60余种。陈运溶除了辑录古方志外，还辑录了南北朝时期湖广地区古方志40多部，每